



■ 2010年度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立项资助出版

大道为公

——长沙《大公报》（1915—1927）与湖南社会思潮

喻春梅◎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大道为公

——长沙《大公报》（1915—1927）与湖南社会思潮

喻春梅◎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道为公——长沙《大公报》(1915—1927)与湖南
社会思潮 / 喻春梅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438 - 7360 - 5

I. ①大… II. ①喻… III. ①思想史 - 研究 - 湖南省
- 1915 ~ 1927 IV. ①B25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1667 号

大道为公——长沙《大公报》(1915—1927)与湖南社会思潮

喻春梅 著

责任编辑: 赵颖峰

装帧设计: 洪杰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6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7360 - 5

定 价: 32.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

郑大华

(一)

中国近代的报刊，最早是由东来的西方传教士创办的。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1822年9月12日，《蜜蜂华报》在澳门创办，这是中国领土上出现的第一份外文报刊；1833年8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据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在南洋和中国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6份中文报刊和11份外文报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迅速增多，到19世纪90年代时，他们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达到200种左右。与此同时，在西方人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了自己的报刊创办事业。1858年香港出版的《中外新报》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但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总共不过十余家，数量非常有限。

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发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创办的报刊就达39种之多，^①其中上海的《时务报》影响最大，它的销售量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7000多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除《时务报》外，当时

^① 参见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著名的报刊还有天津的《国闻报》和长沙的《湘报》。全国在这一时期创办的报刊当然不止此数，美籍华裔学者张灏在归纳各种统计资料后认为，戊戌时期全国共创办的报刊有64种。^① 1898年后，虽因戊戌变法的失败，报刊数量急剧减少，但到了20世纪初，由于清末新政、尤其是革命风潮的兴起，继戊戌政变后又出现了第二次创办报刊的高潮。依据徐松荣的研究，“1898年到1911年，国内先后创办的比较知名的报刊达200种以上。其中上海最多，达80种以上，杂志多于日报；其次是北京、广州、武汉、天津、长沙、北京、广州都在30种以上”。^② 这200多种报刊大多创办于1900年以后，其中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创办的报刊为多，达到120种左右。

中国人自办报刊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发展，但这种发展还是初步的，无论报刊种类还是销售数量都还十分有限。中国报业的快速发展是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五四之后。民国初年，全国的报刊有500多种，“仅1912年2月以后，到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90多种”。^③ 二次革命后，尽管因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癸丑报灾”，全国的报刊锐减至139种，^④ 但随着袁世凯的死去，报刊又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依据胡适的说法，仅1919年创办的报刊就有400多种。另据《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记事录》的记载，1921年时，全国有报纸1134种，其中日报550种。^⑤ 此后，报刊的发展更是空前，无论是种类，还是销售量，都远远超过了民初和五四时期。有资料表明，仅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政府机构和人民团体在不同时期所创办的报刊，就有4505种。^⑥ 全国的大小报刊，总计达6万种左右。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时期报纸有3,000多种，刊物10,000多种。^⑦

①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4月。

② 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③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第676页。

④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第711页。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

⑥ 李永璞等编：《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1919—1949）》，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⑦ 参见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序》，《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在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报刊业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的异军突起。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刊大多是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报刊，而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报刊较少。比如，戊戌变法时期的大多数报刊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创办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是著名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但维新派则是一个政治派别，而非思想和学术性团体，他们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为了开民智，宣传维新变法。在20世纪初创办的200多种报刊中，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创办的报刊就达120种之多，虽然这120种报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无一例外都要服务或服从于革命党人的革命斗争，宣传革命思想。与此同时，先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在20世纪初也创办了不少报刊，这些报刊毫无疑问是为保皇或立宪服务的。除了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报刊外，还有一些纯粹的商业性报刊。和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报刊“与政治联系紧密”不同，这些商业性报刊，“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①但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在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报刊以及纯粹的商业性报刊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如《科学》、《甲寅》、《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潮》、《学衡》、《读书》、《太平洋》、《解放与改造》、《现代评论》、《新月》、《国风》、《独立评论》、《时代公论》、《复兴月刊》、《国闻周报》、《自由与批评》、《中国农村》、《战国策》、《观察》、《新路》、《时与文》、《经济评论》、《思想与时代》等。粗略统计，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有影响的思想 and 学术界的同仁刊物达数百种之多。

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之所以会在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异军突起，数量剧增，分析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尤其是清末派遣出国的留学生这时纷纷回国，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力量，这不仅为民国时期报刊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

^① 胡政之于1943年10月21日在重庆《大公报》编辑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见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同仁刊物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编辑、记者、作者等人才基础，而且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对于报刊的社会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如傅斯年就曾致信胡适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既然报刊有如此巨大的社会作用，所以这些对政治崖岸自高而又忧国忧民的新式知识分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会很自然地选择办报办刊作为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以影响社会的一种方式或工具。第二，进入民国尤其是五四之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尖锐和错综复杂，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及集团围绕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主张，并展开过激烈和复杂的斗争，这为民国时期报刊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现实需要。因为面对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中西文化新的冲突和融合，由于政治立场、文化背景、所受教育、社会地位和个人处境等不同，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的新式知识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为了表达自己的认识和主张，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往往通过创办同仁刊物而结合成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性群体。所以民国时期被学术界称之为“什么什么派”的思想和学术性群体特别多（如新青年派，现代评论派，甲寅派，学衡派，新月派，独立评论派等），而维系这些群体的纽带便是同仁刊物。^①第三，相对宽松的办报办刊环境，民国初年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新闻自由政策，人们有自由办报办刊的权利，尽管后来的北洋政府，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颁布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闻法”、“出版法”或“报刊管理条例”、“报刊检查条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新闻法”、“出版法”或“报刊管理条例”、“报刊检查条例”并没有得到全部的认真执行，社会上还存在着较大的自由办报办刊的空间。此外，民国时期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识字人口的增多，也为这一时期的报刊发展，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经济

^① 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

基础和读者队伍。

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报刊比较，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从报刊的内容来看。如前所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报刊大多是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是服务或服从于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和革命派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如变法、保皇、立宪和革命）或斗争，所以它们的一大特色便是突出政论，如戊戌时期《中外纪闻》刊登的康有为的《强学会序》，《时务报》刊登的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直报》刊登的严复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辛亥革命时期《苏报》发表的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民报》发表的孙中山的《发刊词》、《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新民丛报》发表的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在当时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和这些报刊不同，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尽管也关心时政，议论时政，甚至针对时政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主张或建议，但它们更关心的是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胡适就曾表示过，二十年不干政治，不谈政治，要为中国的改革打下一个思想和学术的基础，尽管他后来没有践履自己的诺言，谈起政治来，但他谈得更多的还是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与此相一致，突出政论不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特色，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特色在强调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以《新青年》为例，它最有影响的文章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前者宣告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后者是新文学运动兴起的标志。也正因为其关注点不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报刊间的争论主要围绕政治问题而展开，如戊戌时期的“变不变法”以及“如何变法”的争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的争论，而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报刊间争论的主要是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如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白话与文言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新道德与旧道德之争”、“疑古与信古之争”、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特色”之争，等等。就是政治问题的争论，也

往往带有浓厚的思想文化或学术争论的色彩，最具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那场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争论。

报刊内容的这一变化，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反映。我们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经历过从物质（洋务运动）到制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制度现代化的阶段，作为这一时期的报刊，它们理所当然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变革中国旧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问题，亦即变法和革命的问题。而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到思想文化现代化的阶段。因此，思想启蒙和人的解放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一时期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关注的主要问题。

其次，从创办者和作者的知识背景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刊的主要创办者和作者，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二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但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还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或者不属于此的其他办报办刊者和作者，他们大多出生于1880年以前，接受过长期的传统教育，不少人还得到过进士、举人、秀才的功名，后因种种原因，或通过短期的出国留学（主要是留学日本），或通过上国内新式学堂，或通过自学，对西学有所接触或了解。所以，新旧杂糅，亦旧亦新，是他们思想的一大特色。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属于新旧过渡时期承上启下的一代，其地位有点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但丁，既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士大夫），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知识分子）。这种地位和出身，决定了他们既不同于旧士大夫，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但同时又和旧士大夫一样，不以某一领域或学科为自己的专长和职业，是“通才”而非“专家”，带有旧士大夫的某些特征。而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创办者和作者，大多出生于1890年以后，有的甚至是1900年之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立宪派和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学生辈，或学生辈的学生辈，他们中不少人留学过欧美，系统地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在国外大学取得过学士、硕士

和博士学位，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并有自己专长的领域（如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理学、工学等）和职业（如大学教授、中学老师、报刊编辑、律师等），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20世纪30年代的《独立评论》为例，在32位社员和主要撰稿人中，有31人留学过欧美，占总人数的96.87%，其中留学美国者27人，占87%，19人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欧洲4人，1人获得博士学位；6人是理工科教授，26人是人文社会学科教授，其中政治学9人，经济学5人，史学4人，文学和教育学各2人，哲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各1人。^①因此，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和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办报办刊者及作者不同，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创办者和作者的思想特色是趋新，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西方的近代思想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多一些。

创办者和作者不同的知识背景，必然会对他们创办的报刊产生一定的影响。就以对西学的译介和理解为例，我们只要比较一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刊和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就会发现，无论是译介的广度，还是理解的深度，前者都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②

复次，从维系报刊的纽带来看。学缘的同门意识和地缘的同乡意识是维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刊的重要纽带。比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的同门意识就非常强烈，他们的报刊大多为同门（即康门）所创办，所主持，非同门之人不得染指。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先后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上海《强学报》、澳门《知新报》和广西的《广仁报》等报刊，其主持人或主笔、主编清一色的是他的万木草堂的弟子。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从事保皇活动，自己或指派弟子在世界各地创办了一大批保皇报刊，和维新变法时期的报刊

① 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② 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9页。

一样，这些报刊也基本上由康有为的弟子所负责，是名副其实的“康门报刊”。^① 康有为本人对此也从不避讳。1902年6月，他在给弟子罗璋云的信中，就把保皇派的报刊称之“门人各报”。^② 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在办报办刊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同门的关系，“甚至将门人关系的好坏当作衡量报刊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③ 曾长期追随康有为、并受康的指派先后担任过《强学报》、《知新报》、《清议报》及《文兴日报》编辑和主笔的徐勤，对同门在办报办刊中的重要作用体会最深，他在致自己老师的信中颇有感慨地写道：“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须同门乃可。……今欲办大事，真非同门不能也。盖草堂师弟之谊，数千年所未有。今日之所以能转移一国者，全在此一点精神也。若舍此而破之，无一事能办矣。”^④ 除了只信任同门、只重用同门外，康有为及其弟子的同门意识还表现在对非同门同户的排挤上。发生在《时务报》内部的康门弟子与章太炎、汪康年等人的冲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如果说学缘的同门意识是维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报刊的重要纽带的话，那么，维系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报刊（尤其是20世纪初的头几年）的重要纽带则是地缘的同乡意识。20世纪初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报刊或具有革命意识的报刊几乎都是同乡会的会报会刊，有些报刊名的地域色彩十分明显，如1902年12月创办的《游学译编》，其创办者是湖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1903年1月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为《汉声》），其创办者是湖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1903年2月创办的《直说》，其创办者是直隶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同月创办的《浙江潮》，其创办者是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1903年4月创办的《江苏》，其

① 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② 康有为：《致罗璋云书》，《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③ 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④ 《徐勤致康有为》（1903年10月26日），《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页。

创办者是东京青年会的江苏籍留日学生；1906年11月创办的《豫报》，其创办者是河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1907年9月创办的《晋乘》，其创办者是山西留日同盟会会员；1907年11月创办的《粤西》，其创办者是广东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1907年12月创办的《河南》，其创办者是河南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1908年1月创办的《四川》，其创办者是四川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1908年2月创办的《关陇》，其创办者是陕西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如此等等。与此同时，国内出版的一些革命报刊，“如《苏报》、《国民日报》、《大陆》、《警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者和组成人员，主要是以江浙籍知识分子为主体”。而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以及遍布于南洋、北美、香港等地的革命报刊，如《檀山新报》（1903年创办于檀香山）、《图南日报》（1904年创办于新加坡）、《广东日报》（1904年创办于香港）、《南洋总汇报》（1905年创办于新加坡）、《中兴日报》（1907年创办于新加坡）、《自由新报》（1907年创办于檀香山）等，其“成员均以广东籍人士居多”。^①就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其内部的同乡意识（主要表现为省界意识）也很浓厚，并形成了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广东人、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江浙人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两湖人这样三个小团体，这三个小团体尤其是广东人和江浙人的相互猜忌、排挤，是《民报》乃至同盟会后来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原因之一。

但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不同，维系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重要纽带不是学缘的同门意识或地缘的同乡意识，而是思想取向或学术志趣的一致性，换言之，创办和主持这些同仁刊物的不是同门或同乡，而是思想或学术上的志同道合者。以《独立评论》的创办人和发起人为例，胡适是学哲学出身，安徽绩溪人；丁文江是学地质学出身，江苏泰兴人；蒋廷黻是学历史学出身，湖南邵阳人；傅斯年是学历史学出身，山东聊城人；翁文灏是学地质学出身，浙江

^① 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73页。

鄞县人；任鸿隽是学化学出身，四川垫江人；周炳琳是学法学出身，浙江黄岩人；吴景超是学社会学出身，安徽歙县人；张奚若是学政治学出身，陕西朝邑人。很显然，这些人既不同门，也不同乡，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共同发起和创办《独立评论》，是因为他们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当时的国际国内问题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主张。由于维系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重要纽带是思想取向或学术志趣的一致性，而人们的思想取向或学术志趣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地位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一旦人们的思想取向或学术志趣发生了变化，同仁刊物也就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或停刊，或分化，其刊物的创办者、经营者和主要作者往往是各奔东西。五四之后《新青年》同仁之所以会分道扬镳，就是因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胡适等人仍然坚守其自由主义立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二)

报刊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认识。张宪文先生在《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一书中曾指出：“报纸是文字史料的一种，也是比较重要的史料，通过它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①这“各个方面”当然亦包括思想。概而言之，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对于民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一份资料说一分话，有十分资料说十分话，没有资料不说话，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思想史研究也不例外。有人说，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理论分析，只要有较强的抽象思辨能力就行，资料的有无或丰富与否都无关紧要。此言差矣！思想史研究确实不同于诸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等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它要求的抽象思辨能力可能更强一些，对于研究者来说，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有新的第一手资料，并有一定的

^① 张宪文：《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文字表述能力，就有可能写出一篇精彩的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或其他“什么史”的文章来，但不一定能写出精彩的思想史文章，因为思想史的文章的特点在分析和说理，它要求研究者本人要有思想。我曾多次给我的研究生、博士生们说过，自己没有思想的人是写不出好的思想史文章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和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等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支学科一样，思想史研究同样离不开第一手资料，其理论分析是建立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之上的，没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何来精彩的理论分析？任何不是建立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之上的理论分析或创新，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得出的只能是似是而非的观点或结论。

第一手资料对于民国思想史研究如此重要，但民国思想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从何而来？在近代以前，确切地说在没有近代报刊以前，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种出版物，如官修或私修的史书、家谱、方志，尤其是思想家的个人著述、日记和书信，以及一些档案材料，如奏折、上书等。到了近代，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报刊成了思想史研究又一重要的资料来源。首先就报纸来看，它除刊登新闻、报道、广告外，还有社论和各种副刊或专栏，这些社论、副刊或专栏的文章，不少就是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天津《大公报》为例，它不仅每天都有“社评”发表，就国内国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先后开过“艺术周刊”、“公开评论”、“科学周刊”、“社会研究”、“医学”、“社会科学”、“现代思潮”、“军事周刊”、“世界思潮”、“社会问题”、“文学”、“文艺”、“经济周刊”、“科学周刊”、“乡村建设”、“明日教育”、“史地周刊”、“电信特刊”、“科学”、“县政建设”、“滑翔园地”、“战国”、“市民与警察”、“工业与科学”、“文史周刊”、“家庭”、“自然科学”、“时代青年”、“电讯”等40多个专业性副刊。这些副刊除少数由报社自己主编外，大多数约请的是社外专家、学者或团体负责主编，如“军事周刊”的主编者是中国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世界思潮”的主编者是对西方哲学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张申府，“社会问题”的主编者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梁漱溟，“文学副刊”的主编者是

著名学者吴宓，“文艺副刊”的主编者是著名作家沈从文，“文史周刊”的主编者是著名学者胡适，“乡村建设”的主编者是乡村建设研究会。据天津《大公报》同人周雨的介绍，对于这些副刊，报社从不加以干涉，“只要言之成理，有发表价值，就让其各抒己见，但是所有副刊都能遵循统一的主题：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在战时则为抗战救国服务”。^①此外，天津《大公报》还根据需要开办过近50个（次）专刊或特刊，开办过“星期论文”专栏，当时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钱端升、蒋廷黻、丁文江、陈序经、梁漱溟、胡道惟、张奚若、罗隆基、王造时、萧公权等都在“星期论文”上发表过文章，而且他们的很多重要文章是先发表在“星期论文”上，然后再发表于其他刊物或被其他刊物所转载。天津《大公报》所发表的“社评”和各种副刊、专刊、特刊和“星期论文”上的文章，不仅为我们研究天津《大公报》史和天津《大公报》主要创办人的思想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同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或思潮、研究各副刊、专刊、特刊和“星期论文”的主编者、作者的思想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就曾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写过一篇《理性的民族主义：“九一八”后的天津〈大公报〉——兼与〈东方杂志〉、〈独立评论〉比较》的文章，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在对待日本侵略、国联调停、废止内战等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天津《大公报》都不赞成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当然它也不赞成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出的与日绝交宣战、反对国联介入等偏激主张，而持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理性的民族主义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②其次就刊物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而言，更是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包括社会思想、思潮和思想家的个人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比如，我们要研究五四前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就不能不利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定期的自然科学期刊——《科学》

^① 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4页。

^② 郑大华：《理性的民族主义：“九一八”后的天津〈大公报〉》，《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月刊，据统计，从1915到1924年的短短9年期间，《科学》月刊刊登的介绍科学的文章即达1000多篇，内容从19世纪传统的电磁学、热力学、细胞学、微生物学，到20世纪初开始盛行的X射线、放射性元素、电子三大发明以及相对论、量子论等，应有尽有。这些文章发表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影响很大。又比如，我们要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离不开《新青年》，试想，假如不利用《新青年》的资料，我们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否进行下去？就是进行下去，又能否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我们要研究20世纪30年代胡适以及以他为中心的一些自由主义学人的思想，就必然会想到以胡适为主编的《独立评论》，因为作为一份同仁刊物，20世纪30年代胡适以及以他为中心的一些自由主义学人的文章主要就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缺少《独立评论》，就不可能对20世纪30年代胡适以及以他为中心的一些自由主义学人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同样，不看《观察》、《新路》、《时与文》、《世纪评论》、《经济评论》等这些抗战后创办的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要想研究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的思想就只能是隔靴搔痒。近年来民国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发展较快，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术界和出版界加大了对民国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发掘和整理，天津《大公报》、《益世报》、上海《申报》、北京《晨报》以及《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学衡》、《新月》、《独立评论》、《观察》等一批报刊被影印出版，为民国思想史学界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对于民国思想史研究之重要性的第一个方面。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和错综复杂，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及集团围绕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主张，并展开过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与此相适应，民国时期的思想呈现出“三多”的特点，即思想和学术性群体（亦可称之为“思想文化派别”）多，思想文化和学术争论多，社会思潮多。而这“三多”特点的形成都与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有关。如前所述，维系思想和学术性群体的纽带是同仁刊物，如以《新青年》

为纽带形成的“新青年派”，以《学衡》为纽带形成的“学衡派”，以《甲寅》为纽带形成的“甲寅派”，以《独立评论》为纽带形成的“独立评论派”，以《中国农村》为纽带形成的“中国农村派”，以《战国策》为纽带形成的“战国策派”，如此等等。民国时期发生的众多思想文化和学术争论，大多是在报刊之间尤其是在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之间进行的，如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之争”，争论双方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和《东方杂志》；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争论双方的主要阵地是《努力周报》和北京《晨报副刊》；1930年代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争论双方的主要阵地是《文化月刊》和《独立评论》；同一时期的“民主与独裁”之争，参与争论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上。至于社会思潮，更是以报刊尤其是以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为载体而潮起潮落的。学术界一般借用西方学者观点，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五四后有的人又用马克思主义来代替激进主义）来概括近代中国（包括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潮。我们姑且不论此种概括是否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事（实际上除这三种思潮外，还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复古主义等众多社会思潮），但就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三种思潮来看，它们都是以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为载体而兴起、演变和发展的。

既然民国时期的思想所呈现出的思想和学术性群体多、思想文化和学术争论多、社会思潮多这三个特点都与报刊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报刊也就为我们厘清民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思想谱系提供了可能。比如有学者通过对《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和《观察》等杂志的研究，来梳理以胡适为中心的所谓“胡适派学人群”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演变。也有学者在解读《新民丛报》、《大中华》、《解放与改造》、《再生》等杂志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从梁启超到张君勱、张东逊的另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我们要研究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发展演变，就不能不研究清末的《国粹学报》、民初的《不忍杂志》、五四前后的《东方杂志》、《学衡杂志》和《甲寅周刊》、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月刊》、《复兴月刊》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等刊物，因为这些刊物构成了文化保